

中国现当代社会文化学论丛

第四辑



社会生活

以婚恋文化等为中心

SHEHUI SHENGHUO TANSUO

探索

梁景和 主 编
褚怡敏 副主编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心 主办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中国现当代社会文化学论丛

第四辑

社会生活

以婚恋文化等为中心

SHEHUI SHENGHUO TANSUO

探索

梁景和 主 编

褚怡敏 副主编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心 主办

“首都师范大学史学丛书”出版资助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社会生活探索：以婚恋文化等为中心/梁景和主编.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7

(中国现当代社会文化学论丛：4)

ISBN 978-7-5656-1612-9

I. ①社… II. ①梁… III. ①社会生活—研究—中国—现代 IV. ①D66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62335 号

中国现当代社会文化学论丛 第四辑

SHEHUI SHENGHUO TANSUO

社会生活探索

——以婚恋文化等为中心

梁景和 主 编

褚怡敏 副主编

责任编辑 张成水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西三环北路 105 号

邮 编 100048

电 话 68418523 (总编室) 68982468 (发行部)

网 址 www.cnupn.com.cn

三河市博文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版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2.25

字 数 417 千

定 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退换

序 言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开始突破革命史的研究范式，向着更加广泛的领域拓展，经济史、政治史、思想史、国际关系史、军事史、环境史等都有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兴起了文化史，在 80 年代中期兴起了社会史，在 80 年代末又兴起了社会文化史。文化史、社会史和社会文化史成为中国近现代历史学科的显学。

20 世纪 80 年代初我在攻读硕士学位的时候，开始对文化史发生兴趣。90 年代初，我在做博士学位论文的时候，是以婚姻、家庭、妇女、性伦作为切入点来研究近代中国陋俗文化的演变问题，我觉得这实际是社会文化史的一个研究课题。2000 年我申请了一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主要研究现代中国（1919～1949）婚姻、家庭、妇女、性伦等文化问题。之后我还开始考虑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社会文化问题。新中国成立至今已近 60 年，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研究这段历史已经显得非常重要。这段社会文化历史从宏观的角度可以划分为三个大的阶段，即新中国初期（1949～1966），文革与徘徊时期（1966～1978），改革开放三十年时期（1978～2008）。当然每个大的时期内还可以划分为几个小的阶段。这些年我的硕士研究生已经开始探索新中国初期婚姻、家庭、妇女、性伦、娱乐等文化问题。我的博士生和博士后也已经开始探索“文革”时期的婚姻和家庭文化问题。我也正在思考如何把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工作推进到改革开放三十年。

当我在思考研究改革开放三十年社会文化问题的时候，我发现这一时期的社会文化是诸多学科共同关注的学术和现实问题。社会文化问题相当广泛，仅就婚姻、家庭、妇女、性伦等问题而言，就是历史学、伦理学、宗教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民族学、文学、教育学、心理学、生物学、医学等多学科所共同关注的。用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当代的社会文化将有助于问题的深入探究。所以组织一个多学科的科研队伍共同研究社会文化问题势在必行。

这实质涉及学科交叉和交叉学科的问题。学科分类是人类根据以往的探索所创造的对自然与社会认识的系统知识的类别划分。它反映了知识系统的性质，也反映了人类认识自然和社会的程度。中国从传统的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再到今天的十几个学科门类、几十个一级学科、几百个二级学科，都反映了以往知识系统和人类认识自然和社会程度的变化。人类探索自然和社会的奥秘是无尽的，所

以学科的调整也不会完结。由于学科分类的束缚和产生的惯性，在各学科之间的边缘地带，往往成为被人忽视之领地，此处也就容易成为知识的贫瘠之地或知识的盲点之域。所以相关学科关注和探索这块边缘地带就显得格外重要，这个知识的贫瘠之地或盲点之域可能就会成为新知识系统的起点和未来学科发展的增长点，甚至会成为新知识系统的亮点之处。可见进行学科交叉或促进交叉学科的建设就有了特殊的重要意义。

近些年来国家和各省市都非常重视交叉学科的建设，就是为开拓新的科研和学术领地，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创造新的知识系统和学术平台。首都师范大学2007年以来也开始注重学科交叉和交叉学科的建设。我负责申报的“中国现当代社会文化学”，就是在以往思考研究和大环境具备的基础上，通过专家的评审被选为学校重点交叉学科的。

“中国现当代社会文化学”是因知识发展需要而力求建设的一门新交叉学科。本学科是研究中国现当代社会生活与其内在观念形态之间相互关系及其形成新知识体系的学科。本学科涉及哲学、经济学、法学、文学、历史学、教育学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的六大学科门类，涉及伦理学、应用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近现代史、教育学、心理学、生物学等一级或二级学科，所以是典型的交叉学科，有非常重要的建设意义。

中国社会发展至今天，与世界先进国家一样，关注和改善人们的社会生活成为国家文明进步的一个标志。追求文明进步的社会生活既是人类与国人生命历程的一个向往，也是当今世界和中华民族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我们能够清醒地体会到，无论是当今建设和谐社会，还是实现小康的发展目标，无论是提倡以人为本，还是关注当代民生问题，其实质都是要真正改善和提高国人的社会生活水平，提高国人的生活质量。从历史学的演进来看，当今西方新社会史和新文化史的发展以及国内社会文化史的兴起，都反映了历史学在关注政治史、精英史和上层社会史的同时，也开始关注民众史、个体史及社会生活史，把真正的民众个体关怀变为史学的一个重要功能，进而体现史学的致用态度和实用价值。关注社会生活不是历史学独有的学术志趣，人文社会学科的诸多领域都具有这样的关怀。从这个视阈来看，我们研究中国现当代社会生活与其内在观念形态之间相互关系及其形成的新知识体系，就具有了重要的现实意义。那么中国现当代以来民众的社会生活状态如何，为什么会是这样，决定这种生活状态的主要因素和相关因素是什么，有哪些经验和教训，今天的社会生活有哪些发展和新的内容，有哪些具体的实际问题，人们需要反思什么，要做些什么，要发扬什么，要控制什么，对中国未来的社会生活我们有哪些期盼、有什么创意的设计和预测，如何推动社会生活向文明健康的方向发展等，这些问题是中国现当代社会文化学需要思考和关注的，也是建设中国现当代社会文化学学科理论与现实意义的体现。

本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为传统的史学理论与方法；二为

借鉴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三为创新的理论与方法。可以说本学科所采用的是以历史学理论方法为纵向，以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理论方法为横向的纵横交错的综合性的理论与方法的协调统一。

本学科是研究和探索 20 世纪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和新世纪以来的中国现当代社会生活与其内在观念形态之间相互关系及其形成系统知识体系的学科。本学科的问题意识是历史的，涉及的具体问题是历史、现实与未来所共同拥有的。它是在扎实的历史研究的基础上，来深入思考社会生活的历史与现实、现实与未来的走向问题。

社会生活的很多问题都是伦理问题，需要从伦理学的哲学高度去诠释。社会生活的具体样法又是经济的一种反映，需要从经济学的角度去研究。社会生活又是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可以直接进行社会生活的探索。文学作品是从文学的视阈揭示社会生活的本质，从这个问题本身来看，它与历史学是相通的。社会生活又反映着社会政治，政治影响着社会生活。社会生活与教育和心理也存在着互动的关系，所以政治学、教育学和心理学的理论方法也同样可以用来探讨社会生活问题。社会生活是运用多学科理论方法综合探讨历史与现实问题的领域。

本学科不但涉及理论方法的建构和创新，也涉及本学科知识体系的架构，所涉及的内容宽泛复杂，主要包括衣食住行、婚丧嫁娶、两性伦理、休闲娱乐、流行时尚、装饰美容、强身健体、休养生息、医疗救治、心理卫生、生老病死、福利保障、民俗风情、节日旅游、日常消费、宗教信仰、迷信祭祀、求职就业等，并随着我们认识的扩展和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增加新的内容。

梁景和

2011 年 10 月于首都师范大学

目 录

1	理论卷	
3	日常生活史与社会文化史	
	——“新文化史”观照下的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	常建华
20	关于社会生活与社会文化的思考	李慧波
27	弗雷泽的三维公正观	肖巍
39	婚恋卷	
41	新中国“十七年”婚姻礼俗的演变(1949—1966) ...	梁景和 姚立迎
46	试论新疆维汉通婚	张友国
52	井陘县近三十年来彩礼变迁研究(1978—2008)	马媛
64	妇女社会动员、婚姻自由与中共革命	
	——红色苏区婚姻制度变革的相关考察	陈珺
74	近十年来民国婚姻史研究新趋向述评	徐晨光
87	家庭卷	
89	闽南民间信仰对社会教化与家庭的影响	张晓松
96	民国时期妾家庭权利变化	王翔

103	性别卷	
105	管道升的世界	
	——个案解析：诗情画意中凸显的社会性别	
		王瑞来 白 路
127	共和国的工业长子	
	——男性气质与大型国有企业男性工人	王向贤
141	新中国成立“十七年”典型男性形象塑造研究	沈 钰
152	性别化的中国城市大众文化	
	——北美的中国性别史和城市大众文化研究	王 燕
163	中国共产党关于阶级解放与妇女解放关系的基本主张	
	——中共首部全国代表大会妇女运动决议及相关文献研究	
		韩贺南
175	女子新剧与民初女性文化的兴起.....	林存秀
187	女性的处境及出路	刘淑丽
192	论近代中国传统女性崇拜之主观载体	王 芳
210	“女性”和“性别”观念在近代中国的建构	
	——以《妇女杂志》为例	宋少鹏

212	民国初年女性的教育问题与女性性犯罪探悉	艾 晶
222	“妇女回家”与中国妇女解放 ——以“妇女回家”论争为中心的考察	范红霞
231	践行“女国民”：“五四”时期湖南女学生的社会参与	万琼华
238	观念传承与生育阵痛：民国乡土妇女生育探微	杨剑利
247	枪或洋娃娃——女性地位问题之我见	李 燕
250	试论近代中国的女子警察	姜 虹
258	妇女解放 ——从理论到实践	王 琪
264	晚清女学的视觉呈现 ——以天津画报为中心的考察	秦 方
277	叙事自我视角：“性”的解释功能	王小平
283	综合卷	
285	云南/广西籍前儿童非法/非正常流入福建省的调查研究 ...	李建辉
315	简析 1912—1928 年北京的旅游业	万稚文
325	小说和影视作品中的“文革”娱乐	谭 君

338	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再出发 ——“西方新文化史与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 学术研讨会综述	杜 涛
342	第二届“文革史”学术研讨会综述	杜 涛

【理论卷】

日常生活史与社会文化史

——“新文化史”观照下的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

常建华^①

改革开放以来,有关文化史、社会史以及社会文化史的讨论在中国持续不断,近年来受西方新文化史^②的影响,有关社会文化史的讨论趋向热络。然而在社会文化史的论述中,对于日常生活史与社会文化史关系的讨论尚不充分,也比较缺乏“新文化史”的视角。因此我想结合对相关学术史的观察,试就日常生活史与社会文化史的关系谈点感想,以就教于专家。

一、西方新文化史中的日常生活

毫无疑问,西方新文化史是西方文化史的学术历程中的一部分。对于西方文化史的述评已有不少,著名史学家彼得·伯克的《什么是文化史》于2004年首次面世,2008年出版第二版,并增加了后记——《21世纪的文化史学》,这是目前最具权威也可能是最新的评论西方文化史的著作^③。我想首先从这本书看看日常生活和文化史研究中的位置。

根据彼得·伯克的梳理,文化史的研究历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经典”阶段、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艺术的社会史”阶段、20世纪60年代的“大众文化史”的发现阶段以及“新文化史”阶段。

1800—1950年这一时期属于文化史的“经典”阶段,此时的文化史学家们关注的是经典作品——艺术、文学、哲学、科学等学科中杰出作品的“典范”——的历史。文化史学家特别关注不同艺术类别之间的关联。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文化史学家要属雅各·布克哈特和约翰·赫伊津哈。布克哈特在其最有名的著作《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1860)中,描述了他所说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文学、哲学乃至政治生活中的个人主义、竞争意识、自我意识和现代性。赫伊津

① 常建华: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研究方向:明清社会史。

② 李霞、杨豫:《走向开放的综合——新文化史学探析》,《国外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周兵:《西方新文化史的兴起与走向》,《河北学刊》,2004年第6期。

③ [英]彼得·伯克著,蔡玉辉译:《什么是文化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哈在《中世纪之秋》(1919)中讨论了诸如骑士风度那样的生活理想,也讨论了衰落感之类的主题,还有象征主义在中世纪晚期的艺术和思想中的地位,以及诸如对死亡的恐惧等这样一些情绪。该书把形式或行为规范放在中心位置上。不过,赫伊津哈曾经写道:“如果我们看不到生活在其中的人,怎么能形成对那个时代的想法呢?假如只能给出一些概括的描述,我们只不过造就了一片荒漠并把它叫作历史而已。”^①强调了人的生活对于文化的重要性。

在“艺术的社会史”阶段,经历了从社会学到艺术史的演进。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04)为经济变化做出文化的解释。其后,另一位德国社会学家诺贝特·埃里亚斯《文明的进程》(1936)研究了餐桌礼仪的历史,以便揭示西欧宫廷内自我控制或情绪控制的渐次发展过程。德国式的文化史研究中,阿比·瓦尔堡关注古典传统及其漫长的转变过程,探讨了文化的或概念的图式或公式,如表达特定感情的手势。德国的上述研究影响了美国、英国的文化史研究。就学术传统而言,美国的“观念史”研究传统比文化史更强。20世纪30年代因躲避希特勒的迫害流亡到英国的匈牙利社会学家,是一批关注文化与社会的马克思主义者,影响了英国的文化史研究。

“大众文化”的概念来源于18世纪后期的德国,当时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开始发掘民谣、民间故事、舞蹈、礼仪、艺术品和手制工艺品。古典学者、民俗学者、人类学者一直关注大众文化的历史,到了20世纪60年代,一批职业历史学家转向对大众文化史的研究。之所以这时大众文化史兴起,在于学者不满意过去的文化史把普通民众排除在外,政治史、经济史也把文化排除在外。对于大众文化的研究,诞生了爱德华·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1963)这部影响深远的著作,该书探讨了大众文化对阶级形成的地位。“大众文化”的概念也引起争议,焦点在于是否包含精英文化,如何统合二者对于文化史研究十分必要。倒是人类学的文化概念具有更大包容性与伸缩性。“人类学关注日常生活,关注劳动分工相对不发达的社会,从而推动了‘文化’一词的广义用法。”^②正是这种人类学的“文化”概念,使得文化史学家以两个孪生式的运动“历史人类学”、“新文化史”开创了属于自己的时代。

“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文化史的实践出现了一个最明显的特征,那就是朝人类学研究方法转向。”^③因此,彼得·伯克还指出:“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历史学家对‘文化’一词的使用逐渐发生了转变。这个词以前是用来指称上层文化,但现在把日常文化也包含在内,包括习俗、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换句话

① [英]彼得·伯克著,蔡玉辉译:《什么是文化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页。

② [英]彼得·伯克著,蔡玉辉译:《什么是文化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3页。

③ [英]彼得·伯克著,蔡玉辉译:《什么是文化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4页。

说,历史学家越来越接近人类学家对文化的看法。”^①在人类学家看来,“一种文化离我们越远,我们就越容易将它的日常生活当作研究对象来对待。”^②借鉴人类学的历史学家因而也就会将目光投向“日常生活”,借鉴人类学家广义的文化概念,探索日常生活的社会史家也会关注艺术和文学的符号学研究。历史人类学者特别关注人类学家的一些著作,如马塞尔·莫斯的礼物研究、爱德华·埃文斯·普里查得的巫术研究、玛丽·道格拉斯的纯洁研究、克利福德·吉尔兹的巴厘岛斗鸡研究、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研究。把社会生活作为戏剧化表演分析,在具有历史人类学色彩的文化史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碰撞,也促成了“微观史学”的兴起,在意大利尤为突出。20世纪70年代诞生了两部微观史学的代表作,埃曼纽尔·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1975)、卡洛·金兹堡的《奶酪与虫子》(1976),《蒙塔尤》在社区研究的框架下,揭示了物质文化和心态,《奶酪与虫子》讨论了社会下层的世界观。微观史学在方法论上,采取分析社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新文化史”一词的使用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新文化史之“新”在于其为了将“文化”,“区别于思想史,亦即主张把研究重点放在心态、预设或情感上,而不是放在观念或者思想体系上。”^③同时,也用来区别于社会史。有四位学者对新文化史的实践贡献了重要理论,即米哈伊尔·巴赫金的《拉伯雷和他的世界》(1965)提出的“狂欢节化”、诺贝特·埃里亚斯《文明的进程》(1939)的论文明、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1975)的论体制、皮埃尔·布尔迪厄关于“场域”的概念、实践的理论、文化再生产的思想和“区隔”的观念。“实践”是新文化史的口号之一,“实践”理论来自于布尔迪厄,关涉他的“惯习”概念。“他认为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者的著作中提出的有关文化规则的思想太僵化死板,因此他从某种图式框架内的持续性即兴行为的角度去考察日常生活中的实践,而这种图式是被某种文化反复灌输于头脑和身体之内的。”^④语言史、宗教实践、旅游史、收藏史都是实践历史学的领域,而科学史朝着日常生活实践方向的转变更加明显,最受欢迎的实践史学则是阅读史。“表象”是新文化史的核心概念之一,认为图像和文本就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映或摹仿,与此相关的记忆史盛行。一些文化史家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转向物质文化研究,探讨食衣住的符号性而不仅仅是消费的历史。新文化史日益繁荣的是身体史,它是从医疗社会史中发展出来的,但文学艺术与社会学、人类学家的加入拓宽了视野。将“表象”视为现实的“建构”或“生

① [英]彼得·伯克著,蔡玉辉译:《什么是文化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7页。

② [英]彼得·伯克著,蔡玉辉译:《什么是文化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1页。

③ [英]彼得·伯克著,蔡玉辉译:《什么是文化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7—58页。

④ [英]彼得·伯克著,蔡玉辉译:《什么是文化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6页。

产”的理论，也是新文化史的重要内容，这样阶级、性别、共同体、君主制、个人的身份被作为建构的产物处理，前面提到的将社会生活作戏剧类比发生了转向使用表演与场合的分析，来反对僵化、固定的观念。

据彼得·伯克说，进入20世纪90年代，“新文化史”开始渐入颓势，遭受多方面的批评，文化转向面临着超越。他指出了三种趋势：一是复兴传统的文化史，二是新文化史扩大到以前被忽视的政治、暴力与情感等更大的领域，三是反对用建构的方法对社会和文化加以归纳。

彼得·伯克在《什么是文化史》的“后记”还介绍了21世纪的文化史学，概括起来就是文化史的某些领域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其中包括身体、民族认同以及观念的文化史。

借助彼得·伯克关于《什么是文化史》的研究，我们概述了包括“新文化史”在内的西方文化史的发展脉络。我们会发现文化史与社会史交织在一起，特别是当大众文化研究兴起后，作为大众的社会与文化合流，而历史人类学、新文化史都是以作为社会构成的人为依托的，所以“新文化史”包括社会与文化，相当大的程度上也可以社会文化史代替。早在1999年彼得·伯克访问我国华东师大历史系，演讲题目是“西方新社会文化史”，指出“新文化史”或“社会文化史”的兴起，它常被视为更广义的“文化转向”的一部分，即将“新文化史”与“社会文化史”等同^①，或者干脆称之为“新社会文化史”^②。

不仅如此，日常生活也贯穿文化史的学术关怀之中。早在文化史的“经典”时代，赫伊津哈就提醒人们对于文化要关注“生活在其中的人”。“在德国和荷兰，新文化史被嫁接在布克哈特和赫伊津哈的传统之上，更为重视所谓的‘日常生活史’。”^③特别是大众文化的研究深受人类学的影响，而人类学关注日常生活，新文化史是从历史人类学中发展起来的，至于新文化史的“实践理论”很大程度上是指日常生活的实践。新文化史在向更多的领域扩大，在战争等政治与军事史的传统主题方面，“却是从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角度来加以研究”^④。因此，日常生活史始终是文化史展示理论与实践的舞台，日常生活史与新文化史、社会文化史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甚至可以说日常生活史是新文化史、社会文化史的组成部分。

① [英]彼得·伯克著，刘华译：《西方新社会文化史》，《历史教学问题》，2000年第4期。彼得·伯克在南京大学历史系就欧洲新文化史学的发展作了专题讲座。讲座结束后，进行了讨论，涉及的内容主要集中于新史学运动之后欧洲新文化史发展的新趋势，讨论的内容可参见杨豫、李霞、舒小昀：《新文化史学的兴起——与剑桥大学彼得·伯克教授座谈侧记》，《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1期。

② 李宏图：《当代西方新社会文化史述论》，《世界历史》，2004年第1期。

③ [英]彼得·伯克著，蔡玉辉译：《什么是文化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6页。

④ [英]彼得·伯克著，蔡玉辉译：《什么是文化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5页。

如果说只引用彼得·伯克对“新文化史”的论述显得单一的话，那么我们再补充另一位著名文化史家罗伯特·达恩顿的看法：“最令人激动、最有创意的历史研究应该挖掘出事件背后我们的前人所经历和体验的人类生存的状况。这类研究有过不同的名字：心态史、社会思想史、历史人类学或文化史（这是我的偏好）。不管什么标签儿，目的都是一个，即理解生活的意义：不是去徒劳地寻找对这一伟大哲学之谜的终极答案，而是从前人的日常生活和思想观念中去探求和了解对此问题的回答。”^①姜进解释道：新文化史注重于细致描述具体人群的具体生活，“无论是貌似平静的日常生活，还是轰动一时的重大事件，新文化史研究的焦点都是当地参与其中的人群对自己诉求的特殊方式，相信生活在过去的男男女女正是以自己特殊的生存战略和对自由解放的向往开辟了人类生活方式的无限可能性。”^②日常生活之于新文化史的重要性，显而易见。

新文化史、社会文化史研究离不开日常生活史的探讨，反之，日常生活史需要借鉴新文化史、社会文化史的理论方法。

二、中国文化史与社会史的对接

文化史与社会史都是20世纪出现于中国现代史学的，均受中国历史发展的制约，经历了较大的波折，呈现出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大致经历了民国时期兴起、新中国成立后30年停滞与改革开放后30年复兴三个时期，各时期有各自有阶段性的变化。清末民初，受海外人文与社会科学特别是史学研究的影响，在梁启超、李大钊等学者的推动下，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化史、社会史兴起，从历史上的社会、文化思考中国的特性与发展前途，出版了一批学术著作。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中国文化史、社会史的学术研究陷入了十余年困难境地，学术论著出版数量锐减，但也有个别水平较高的专著的问世。

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化史研究作为与政治、经济鼎足而立的领域而存在。然而随着土地制度问题，农民战争问题，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古代史分期的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问题，展开了热烈的争鸣，成为50年代史学界盛开的“五朵金花”。从50年代后期起，综合性的文化史研究淡出学术界，罕见从整体上探究中国文化发展过程或全局问题的论文。社会史则继承“中国社会史大论战”的传统，以社会经济史为标志的社会形态研究保留下来，“五朵金花”的探讨中依稀可见社会史的身影。然而，反映民众生活的研究难见踪迹。

^① [美]罗伯特·达恩顿著，萧知纬译：《拉莫莱特之吻：有关文化史的思考》，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7页。

^② 姜进主编：《新文化史经典译丛·理论经典》，“总序”，载[美]林·亨特主编，姜进译：《新文化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页。